

国际贸易、税制与 经济改革策略

徐滇庆 著

A large, abstract graphic composed of numerous overlapping purple squares and rectangles of varying sizes, creating a dynamic, pixelated effect that flows from the top left towards the bottom right.

现代经济学学术丛书

现代经济学学术丛书

国际贸易、税制与经济改革策略

徐滇庆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会科学出版社精心策划了现代经济学学术丛书,并且承蒙厚爱,把我的这些文章也包括了进去,在此也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文章中如有谬误之处,自然是我个人的责任。

徐滇庆

1996年8月22日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贸易、税制与经济改革策略 / 徐滇庆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11

(现代经济学学术丛书)

ISBN 7-5004-2131-1

I. 国… II. 徐… III. ①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文集②对外贸易-研究-中国-文集 IV. F1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5249 号

Fu 2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4

字数: 203 千字 印数: 1—8 000 册

定价: 14.00 元

出版说明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在经济学术界有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活跃在经济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前沿，对中国经济改革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了各种见解。这些见解，对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繁荣和发展经济理论研究具有借鉴和启迪作用。为了使广大读者了解他们的学术见解，我们特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出版，供研究参考。当然，其中有些观点不尽妥当，也并不代表出版者的观点，这是需要指出并申明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经济学编辑室

《现代经济学学术丛书》

编辑委员会

编 委 (以姓氏拼音为序)

崔之元 林双林 马长山 汪丁丁 肖 耿
徐滇庆 杨小凯 叶南奇 易宪容 俞 卫
张 红

策划人 易宪容



作者简介

徐滨庆:东北大学自动控制系学士,华中理工大学经济管理系硕士,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系博士,曾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现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经济系教授,东北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兼职教授,沈阳市政府顾问。主要研究领域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区域经济最佳区位理论,发展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等。在国际和国内主要经济学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著有“政府和经济发展”,并主编了《中国经济改革——分析、反省、前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台湾经验与海峡两岸发展策略》(中国经济出版社)等书。

责任编辑 张 红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郑以京

序 言

徐滇庆先生现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经济系教授。说来也有缘分，他与我都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虽然时间先后相隔近四十年，我仍以师弟相待。对他的学术成就我抱有特殊的欣喜之情，因为其中也凝聚着培刚师教诲的一份心血。

关于他在国外发表的论文，我没有读过，不了解。但从这本即将出版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一部分。这本书中收集的论文，大部分是他研究中国经济的成果。有几篇关于台湾的研究和游独联体国家记闻的文章，也都联系到了国内的经济。

留学并留居国外的学习经济学的中国学者出于对祖国的关心，近年研究中国经济成为一种时尚，常有佳作问世。这是一种令人欣喜的现象。可以起到与国内的经济研究者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作用。徐滇庆教授的这本书就是其中的佳作之一。在收到此书的书稿后，我抽空几乎是一口气地把它读了一遍。这里谈一点粗浅的印象。

本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娴熟地把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用于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在本书的许多文章中都运用了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GE)，对研究的问题作了定量的分析。这样得出的结论更为具体、确切可靠，更具有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例如，在“个人所得税改革及其对经济系统的冲击”一文中，

作者提出了如果大幅度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并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在税收中的比例，在不降低居民生活标准和不减少国家税收总额的前提下，把相当一部分税负从企业的非直接税转变为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个人所得税，这样，既可缩小贫富差距，又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的论点。作者利用CGE模型，进行计算，验证这个论点，并以不同的模拟方案得出不同的数量的结果。例如，如果各部门职工工资增加300元，同时向每个职工相应征收个人所得税300元，企业的非直接税相应减少，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可增加65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35%。职工储蓄率可上升29.8%，社会投资总额可上升24.3%，政府税收收入可上升6.06%。其他方案则有其他结果。这样的研究自然会使我们在进行税收改革时更加心中有数，选择最佳方案。

作者在“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策略研究”等文中也运用CGE模型作了计算。这种计算对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是很有用的。因为正如作者所说，削减不同产品的关税对国民收入和经济结构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因此，在谈判中应当先削减那些对国民经济负作用不大的那些产品的关税。为了更多读者的方便，书中没有引出利用CGE模型的具体计算。在有些文章中，甚至也没有列出计算的结果，但作者论证问题的方法和论证的理论依据对我国的读者仍是有启示的。

众所周知，我国在处理各种经济问题时往往缺乏明确的理论依据，不进行实际的计算，这样往往发生失误。例如，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往往发生盲目进口和盲目出口。不进行经济计算，而导致巨大的损失。作者在“中国粮食问题研究”一文中通过利用CGE模型的计算得出了非常有意义的结论。由于在国际市场上稻米比小麦贵1.45倍，而在国内市场上稻米价格仅为小麦价的85.7%，这样如果把一亩小麦地改种稻米，并把稻米出口换小麦，那么通过出口贸易可使每亩地增加利润264.6元。361公斤稻米可换回630公斤小麦。这自然是很上算的。进而作者又论证在一亩小麦地

上改种黄麻，通过国际贸易可以换回小麦 1092 公斤，即比种小麦多收获粮食 5.38 倍。这种计算虽然不一定准确，因为国际、国内的价格变化不定，但利用文章提出的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改变我们在粮食贸易中的亏本状况。

我曾读过某些留学外国，并在外国工作的中国学者写的有关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文章。他们想为祖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贡献力量的初衷很好，但有的论文不能切中要害。他们的通病在于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就制定某种数量模型，通过数学的推导，得出某些结论。这些结论与中国的实际相距甚远。他们往往把西方国家的经验不加区别的用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结果是“南辕北辙”，不能解决问题。这当然不能都怪他们。因为他们离开祖国已有较长的时日，对祖国的情况不甚了解，而他们学的又只是西方的东西。

徐滇庆教授与许多海外学者不同，他近年来常回祖国，有时一年回来几趟。回来后不仅走访经济领导部门、科研机构，而且深入基层、深入企业，即掌握全面资料，又作案例调查。我们从本书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到，他在研究某些问题时，掌握的资料是相当丰富的。不仅有中国的资料而且有外国的资料，从而才能运用 CGE 模型。他除掌握统计资料外，对国内经济的实际情况也是相当了解的。不仅前面提到的几篇文章可以说明，而且“筹集社会保障金对经济系统的影响”一文更可说明。这篇文章指出，在筹集社会保险基金中，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面各应承担多大比例，各种筹集失业保险金的办法对整个经济系统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需要做定量研究。此文着重研究职工个人筹集的失业保险金，采用向国家缴纳社会保险税的办法，还是采用按个人收入的一定比例定期储蓄，参与社会投资的办法，对整个经济系统会主生怎样的影响。在研究中作者利用众多数据做了模拟计算，得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结果。

我们从作者在对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比较研究中，（见

“改革速度与失业危机”、“两种不同的经济改革模式”等)也可以看到作者对中国的经济改革的进程及其遇到的问题是下过一番了解和研究的工夫的。可能人们对他的分析和见解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人们不会说他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在1996年8月初,在他的大学召开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上,他就说过,他建立了有关中国经济的丰富的资料库。由此可见,他为研究中国经济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前面谈到,我几乎是一口气把这本书读了一遍,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本书读起来引人入胜。且不说那几篇带有游记性的文章,如“俄乡记闻”,“中亚记闻”读来很有趣味,而且那些严肃的学术文章读来也不枯燥。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的文字生动,另一方面是由于作者能将艰深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用明了易懂的方式加以叙述,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了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本书中的“美中贸易战”、“车到‘关’前必有路”也是突出的例子。当然我不是说经济文章只能这样写,作者必须这样写。但是,如果不是写给专业的经济理论家看的,而是写给普通的经济工作者看的,那么就应该写得深入浅出。作者在这本书中把CGE模型的计算程序省去了,只列出了其计算的结论,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对于本书各篇文章的观点,我在这里不作评论,因为那不是一篇短的序言所能承担的。尽管这样,我可以简单地说,书中的观点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有作者许多创见和独特见解。我想这是与作者有过良好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的训练,对西方市场经济有多方的了解分不开的。深信读者在读了本书以后会有同感。

董辅初

1996年10月23日

前言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易宪容先生的邀请,我把自1993年以来用中文写的一些经济学论文汇编成集,奉献给读者。

有人问我,为什么没有看到你在1993年以前写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论文?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是否可以先谈谈大多数海外经济学人的一个具有规律性的问题:什么时候他们才会开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然后,再探讨一下他们最好在哪些方面努力?

在北美的名牌大学读一个经济学博士,一般需要五六年。前3年拼命读书考试,后3年选修一些专业课、收集资料、写博士论文。在一般情况下,导师都不愿意指导那些他们所不了解的课题。试问,在北美有几个经济系的教授了解中国经济问题呢?如果一个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选了一个和中国经济不大相干的题目,那是不足为奇的。

拿博士学位并不十分困难,但是要在北美的大学里找一个教职就难得多了。当前北美失业率很高,如果在大学里有一个空缺,申请的人往往有好几百。假定一切顺利的话,在北美的大学里找到一个教职,才算是有了一个搞学问的立脚点。

能不能马上开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呢?就是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能力。

第一年要过教学关。

无论是系里的教授还是研究生、大学生都会用别样的眼光来

盯着你：以往中国人在西方的形象大多是餐馆老板、厨师。今天，一个中国人登上了大学讲台，会讲英文吗？会教课吗？懂得多少经济学？如果在第一年没有教好，例如，黑板上写了错别字，所答非所问等等，留下了话柄，后遗症就大了。所以，登上讲台的第一年就像小媳妇一样，战战兢兢，写讲稿、备课、改作业、改考卷一点都不敢马虎。

如果一切顺利，在期末考试之前学生给的教学评价不错，方才可以喘一口气。紧跟着系主任就找上门来。他有他的难处。当初招一个中国人回来，为的就是要给系里增加一些名声。经济系在全美排名榜上的位置主要就看发表的论文。所以，系主任会很耐心地提醒你，到了发表论文的时候了。

对于新科博士来说，最简捷的办法就是把博士论文整理一下，送出去发表。西方学术刊物的审稿周期一般为4—6个月。通常，好刊物的接受概率还不到10%。辛辛苦苦写好论文，寄了出去，等上几个月，结果拿到一封拒绝信，这是常有的事。如果在就职的第一年就把论文送了出去，到了第二年往往就收到了拒绝信。怎么办？只有一条路：不折不挠，屡败屡战。随着拒绝信寄来的还有审稿人的意见，认真读读，修改修改，换个杂志再投出去。第二个循环又得要半年多。如果手头上只有这么一篇文章，连续被拒绝上两次，那就比较危险了。要是拒绝信拿得多了，系主任的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为了保险起见，最好再写上几篇有可能被接受的论文，不停地送出去。

能不能用中文写些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章呢？没有人说不可以，关键在于没有人知道你写的文章是好是坏。一般来讲，写中文论文是不算数的。如果身临其境就很容易理解，这并不是什么歧视或偏见。如果中文论文也算数的话，阿拉伯文算不算？朝鲜文算不算？还有其他的文字算不算？谁来当裁判？对于不懂得这些文字的学者来说，不公平。就像体育运动一样，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运动，但是到了奥运会上，无论是跳高、游泳、篮球、足

球都得有一个共同的竞赛规则。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者，就得遵照在国际学术界存在多年的竞争规则，用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看得懂的英文在第一流的刊物上发上几篇论文。用这种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学术水平。至于如何修改竞争规则是以后的事情。

在西方大学中，一个系里的教授都各有所长，每个人专攻一个领域。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竞争对手根本就不在系里，用不着和系里的人拉关系、费口舌。在全世界被学术界公认的好刊物就是那么几十份，就好像是足球、排球的那几个世界大赛。如果打不进那些刊物，无论自我感觉如何良好，也不会得到同行的普遍承认。新教授的合同最长不过3年。过了第2年，系里就要讨论是否续聘，到那个时候，系主任就不会客气了。

再一个假设：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论文发表了，无论数量和质量都符合系里老教授们的期望，第3年开初，他们就要来问还有没有潜力？他们的意思是，过去的论文也许是在导师的帮助下作出来的。是不是能够在将来还有所成就？怎样才能证明研究的潜力呢？最好的办法是看看能不能够申请到科研基金。能够拿到多少国家级科研基金也是评价一个学校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为了申请科研基金就得全力以赴写研究提案。在某种程度上，申请科研基金比发表论文还要困难。近年来，美国和加拿大都面临着巨额政府赤字，不得不大幅度削减政府预算。国家基金大大缩小了资助面。僧多粥少，面对的竞争更加激烈。因为没有知名度，研究提案就得写得特别仔细、认真。为了提高命中率，甚至要把研究做好60%以上，才敢于提出申请，让基金会觉得只要再稍微资助一下就可以出成果了。由于没有经验，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学会写研究提案。

还是那个假设：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拿到了科研基金（最好是资助几年的大项目），系主任才算松了一口气。他招聘新人的任务完成得比较出色，系里的教授们也不敢小看人了。只有到了这

那个时候，你的研究和教学能力才能得到大家的承认。往后再干些什么就没人管了。在北美的大学中，无论是系主任、院长还是校长都无权干预教授的研究方向和选题。只有拿到了终身教职，才算真正取得了独立，这才到了集中力量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时候。

在上面列举了许多的假设，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假设没有兑现的话，海外学子就会身不由己地走上了另外的道路。可供选择的方案很多，也有各种各样的报国之门，在这里就不一一详细叙述了。有一句话是大部分海外华人都能接受的：华人只有两种比较稳定的工作机会：美国人不能干的，或美国人不愿意干的。

在海外的中国经济学人能够为祖国的经济改革做些什么呢？为了不流于泛泛之谈，首先要给在海外的学者定定位，研究一下什么是海外学人之长，什么是他们之短，才能扬长避短，做到人尽其才。

海外学人就读于世界著名的学府，师从于名流大家，熟悉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一点要比国内优越得多了。在北美，研究资料十分丰富，学风比较严谨，比较容易做到博览群书，经常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眼界开阔，知识面比较宽，信息量比较大。这是国内学者们最为羡慕的。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海外学者的优势所在。

可是，海外学人也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从出国之日算起，到在北美名牌大学里站住脚，大概要8—10年，生活在洋人的圈子里，离中国的实际越来越远了，对中国的理解还停留在出国之前的水平上。对于海外经济学人来说，要研究中国问题必然会有一个重新熟悉中国国情的过程。能够在海外的竞争中过关斩将，必定拥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好在于此、长于此，只要有一颗爱国心，这个障碍并不是不可逾越的。但是，毕竟要花费相当大的努力。

在这个关头，海外学人通常面临着一个误区。在事业有所成就的时候，容易忘乎所以，夸大自己的本事。在恭维声中，有些

海外学者往往沾沾自喜于表面上的理论优势。回国伊始，就哇里哇啦发些不着边际的议论。把在西方学到的经济学理论生搬硬套于中国的实际，还自以为很高明。凡是这样做的人，大半都碰了钉子。有的人自尊心很强，一旦受到挫折，就退回到已经在北美营就的安乐窝里，继续写那些驾轻就熟的论文，离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越来越远。

要取得在中国经济研究上的发言权，海外学人必须要接受一次再教育，要多次回国考察，放下架子，当小学生，虚心求教，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兼容并蓄，才能得到一点真知灼见。要实现这个转变并不特别难，关键在于如何才能唤起海外学人这样做的积极性。投入为祖国经济改革的研究，也有一个激励机制和组织引导的问题。单凭一般的爱国主义号召和笼统的欢迎，恐怕会使得许多海外经济学家始终和祖国经济改革的现实有一段距离，使不上劲。

有关中国经济改革中的课题非常多，对海外学者来说，选什么研究的题目最好？是搞纯理论课题，还是搞比较结合中国实际的课题？

搞纯理论研究，海外学者的比较优势最强。可是，国内对这种研究的需求似乎并不是那么迫切。

例如，我曾经和一位美国教授（G. Gruver）合作写过一篇关于最佳企业选址的论文。研究企业的生产方程和市场的位置对最佳厂址的综合影响。比起有些论文来，这个题目已经是相当结合实际了。我们用了一个数学模型论证了以前在区域经济学界争论的三方，实际上都可以统一在我们的这个模型之中。从我们的模型出发，对不同的变量求偏导数就可以导致这三派不同的结论。这篇论文结构严谨，从数学到数学，获得了学术界不少好评（这篇文章发表在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 35, 1994）。我完全可以沿着这个突破口继续做下去，再搞几篇论文出来，可是，我却中断了这个题目的研究。因为我知道，在研究中有一个非常重